

doi:10.20270/j.cnki.1674-117X.2025.2015

资产阶级革命派与马克思主义的 “短暂趋近”(1902—1925)

邱雨诗

(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 300350)

摘要: 20世纪初, 在新思潮纷纭激荡与民族危机加深的背景下, 以孙中山、戴季陶、胡汉民、林云咳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发生急剧变化, 他们通过《星期评论》《建设》等重要理论刊物, 积极介绍、阐释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革命派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主要围绕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阶级斗争学说等内容, 客观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的早期传播。与此同时, 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始终坚持三民主义信仰, 无法突破自身局限性, 并且对马克思主义抱有不纯粹的宣介动机, 这最终导致其在历史转折的关头选择与马克思主义彻底分道扬镳。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资产阶级革命派; 早期传播; 三民主义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5)02-0127-08

“Brief Convergence” Between Bourgeois Revolutionaries and Marxism (1902—1925)

QIU Yushi

(School of Marxism,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ideological trends and deepening national crisis, the thoughts of bourgeois revolutionaries represented by Sun Yat-sen, Dai Jitao, Hu Hanmin and Lin Yungai, changed dramatically. They actively introduced and interpreted Marxism through important theoretical publications such as Weekly Review and Construction. The bourgeois revolutionaries' propaganda of Marxism mainly focused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olitical economics and the theory of class struggle, which objectively promoted the early spread of Marxism in modern China. At the same time, because the bourgeois revolutionaries always adhered to the belief of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they could not break through their own limitations, and had impure motives for introducing Marxism, which eventually led them to completely part ways with Marxism at the turning point of history.

Keywords: Marxism; bourgeois revolutionaries; early spread;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收稿日期: 2024-11-06

基金项目: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项目“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南开大学)”(21SZJS12010055)

作者简介: 邱雨诗, 女, 河南驻马店人, 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史。

五四时期是一个思想文化空前活跃的觉醒时代,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群英荟萃、百家争鸣的历史景象,而作为诸多思潮之一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一重要时期也得到迅速传播,许多先进知识分子在新旧思潮的激荡中受其强烈吸引,聚集到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侯外庐指出:“思想史系以社会史为基础而递变其形态。因此,思想史上的疑难就不能由思想的本身运动里求得解决,而只有从社会的历史发展里来剔抉其秘密。”^[1]资产阶级革命派详细考察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现状,看到了社会革命必将到来的历史趋势,展现出与时俱进的进步品质,在五四时期顺应社会主义时代潮流,积极宣介马克思主义学说并积极吸收其中理论观点用以完善自身思想体系。这一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阶级斗争学说的阐释与宣传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恩格斯的历史合力思想认为,单个人因其独特的生活环境会产生不同的意志,每个人的意志都对历史产生作用,但是单个人的意志并非孤立的,而是以社会性的方式发挥作用,历史的最终结果是所有意志融合而成的总的合力作用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成果,亦为历史合力的结果。五四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与马克思主义“短暂趋近”这一引人注目的现象,恰恰是近代不同群体整体地、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其也证明,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一、必然中的偶然:资产阶级革命派与马克思主义“短暂趋近”的历史机缘

首先,日本渠道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重要渠道之一。这一时期,正是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理论家大多有旅日经历,他们在日本见证了社会主义思潮的磅礴之力,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强烈冲击与启迪。日本这一时期涌现出了堺利彦、河上肇、山川均等许多卓越的社会主义学者。这些学者发表了大量著作,如《无产阶级运动的方向转变》《社会主义神髓》《近世社会主义》《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等等。以孙中山、戴季陶、朱执信、胡汉民、沈玄庐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理论家大多有过

旅日经历。他们通过日译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论著以及与日本社会主义学者的直接通信交往活动,及时掌握了日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动态。这个过程也是他们了解、接受、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过程,旅日经历为他们今后研究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条件。

戴季陶、朱执信等人回国后,以日文版为蓝本联合翻译了考茨基的《马克思资本论解说》一书,分为6期刊登在《建设》的第一卷和第二卷上,详细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一部分理论家成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分子,他们翻译、研究日本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对20世纪初的中国舆论界产生不小的影响,客观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

其次,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对资产阶级革命派理论家的深刻影响以及孙中山等终其一生对传统文化的改造与运用,注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资产阶级革命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天然的内在契合性为革命派接受马克思主义提前埋下了伏笔,如唯物史观对资产阶级革命派就有着很强的吸引力。先进知识分子一方面在日本接受近现代社会科学,憧憬平等、民主,另一方面他们自幼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旧式教育,多半是在儒家文化浸润中走出的新式文人,大同理想是潜藏在他们思想深处的天然基因。

中国人普遍有崇古思今的传统心理。孙中山曾以周文王为例抒发兴亡之感,认为周文王正是基于善施仁德的治国理念而可以做到仅凭借百里国土就使人心归服。孙中山希望能将改变劳动人民饥寒交迫的现状与振兴中华民族的宏愿相结合,并将此作为国民党未来活动的重要目标之一。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兼具新式旧式双重影响的资产阶级理论家们,在践行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同时,又不忘继承传统文化的精髓部分。在新的社会环境下面临着如何在大同理想与三民主义之间架起桥梁的问题时,社会主义理论学说所蕴含的精神内涵对他们有着强烈的吸引力。

最后,20世纪初,中国国内诸多社会矛盾激化。恰在此时,世界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俄国,爆发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大批有志之士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所取得的巨大胜利,

屡屡受挫的中国人民由此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与鼓舞。十月革命同样引起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关注与同情。革命爆发不到一年时，孙中山曾向苏俄发过一封贺电，写道：“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2] 贺电内容表明了孙中山对俄国革命的赞许态度。其他资产阶级理论家如戴季陶、朱执信、胡汉民等，对十月革命也持基本肯定态度。他们意识到，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对中国前途的影响不容忽视，研究布尔什维克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势在必行。与此同时，《星期评论》这一国民党重要刊物陆续发表了一系列集中介绍俄国与十月革命的文章，如《俄罗斯劳农政府给我们中国人民的通告》《为什么要赞同俄国劳农政府的通告？》《劳农政府治下的俄国》等。戴季陶等人热情称赞列宁所代表的俄国劳农政府废除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对华政策，以及将中国人民平等地视为东方人民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宣言内容，呼吁中国人民朝着象征着自由平等的社会主义新潮流而奋斗。

二、顺时施宜：资产阶级革命派与马克思主义的短暂趋近

向前追溯资产阶级革命派与马克思主义的渊源，其实，早在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就曾在《复某友人函》中坦言，其对“社会主义”已达到“极思不能须臾忘”^{[3]228}的地步。1905年，孙中山来到比利时布鲁塞尔，并向第二国际书记处提出申请，希望接纳自己及其所领导的革命党组织成员加入第二国际^{[3]272-273}。1905年11月26日创刊于日本东京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4]。据统计，《民报》在这一时期发表过50余篇相关论著，代表性的有孙中山的《〈民报〉发刊词》、朱执信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等等。其中朱执信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生平及理论观点进行了系统介绍，更为可贵的是在文中部分节译了《共产党宣言》——国内学者一般认为这是《共产党宣言》在中国最早的译本之一。1912年10月，孙中山应中国社会党本部之请，作了一场关于其社会主义思想的演讲。孙中山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为研究人类社会发

规律与资本主义运行规律殚精竭虑，终于完成科学的鸿篇巨制即《资本论》。从此，原本无条理的社会主义趋势逐渐趋向系统化科学化^{[5]506}。这反映了孙氏对马克思主义及《资本论》真理性的肯定。这一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对社会主义的关注，成为其五四时期广泛译介、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声。

五四时期前后，报纸杂志等大众媒体开始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6]。作为孙中山追随者的戴季陶、胡汉民、朱执信等资产阶级革命派，对马克思主义表现出极高的研究热情，他们通过发表文章等方式，不遗余力地研究和解读马克思主义。一方面，他们从日文等版本的社会主义著作中吸收新思潮的养分；另一方面，又针对性地运用这些理论对中国的现实进行解读。这构成了当时一条独特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路径。这一时期，他们创办的刊物成为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助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一）对唯物史观的解读与运用

恩格斯将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称为马克思一生的两大发现。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思想之一的唯物史观，立足于客观历史现实，揭示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唯物史观进入中国前，进化论在中国近代思想界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其随着思想家的重构而演化成多种理论形态，如“天理”“两极”“群力”等等。虽然当时进化论已逐渐被唯物史观所取代，但不可否认的是，进步知识分子已有的进化论世界观基础为他们接受唯物史观提供了思想前提。唯物史观同样引起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理论家的广泛关注，其中胡汉民对唯物史观的研究水平较高，他在五四时期的唯物史观传播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第一，胡汉民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含义、主要观点及历史意义。其在《建设》杂志第一卷第五号发表的《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1919）一文开宗明义指出：“唯物史观的意义……但到马克思才努力说明人类历史的进动的原因。以为人类因社会的生产力而定社会的生产关系。以经济关系为基础，而定法律上政治上的关系。更左右其社会个人的思想感情意见……所以创设这个学说的名誉，究竟归于马克思和他友人因格斯。”^{[7]166} 他充分肯定唯物史观的学理性价值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地位。除此之外，胡汉民赞同“唯物史观，

实是平民的哲学,劳动阶级的哲学”^{[7]166},承认唯物史观的阶级性,认为唯物史观是劳动阶级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强大理论武器,并归纳出“过去之历史,总不外为阶级对立之历史”^{[7]174}“阶级斗争,即由社会生产力变化而来”^{[7]175}这样的结论。这一时期,因受到日本社会主义学者划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影响,相当一部分国内学者把“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看作是相互独立的思想,甚至把二者看作是对立和矛盾的,而胡汉民却在论述中将阶级斗争视作唯物史观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作了精辟的论述,展现出他对唯物史观研究的独特视角。目前,国内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胡汉民的研究成果完全可以代表当时阐释唯物史观的最高水平。

第二,胡汉民译介经典著作并驳斥了欧美一些学者以及修正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诘难。他发表在《建设》杂志上的论文《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部分节译了《赁银劳动及资本》(即《雇佣劳动与资本》)、《法兰西内战论文》(即《法兰西内战》)、《经济学批评序文》(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第一卷附注》以及《资本论》第三卷中关于唯物史观的核心论述^{[7]169}。其论证过程真可谓是“有破有立,旁征博引”,驳斥的对象具体包括“以法律的概念代经济的概念而非难唯物史观者”^{[7]170}、“以历史的进化不认经济有最强决定之势力而非难唯物史观者”^{[7]171}、“以为与阶级斗争说矛盾而非难唯物史观者”^{[7]174}等七种代表性观点。其澄清是非,对于维护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性与正统性具有重要意义。胡汉民的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当时研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水平最高的作品之一。

第三,胡汉民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与现状进行剖析。唯物史观作为一种全新的历史观,在五四时期迅速在思想史的研究中得到了运用。胡汉民发表在《建设》的文章《孟子与社会主义》(1919)、《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1919)、《阶级与道德学说》(1920)、《从经济的基础观察家庭制度》(1920)等文章,就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来剖析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哲学史及伦理道德等问题。首先,胡氏在唯物史观的全新视角下系统考察两千多年来中国经济组织与思想的兴衰变迁,将春秋战国时期群英

荟萃的哲学盛况与秦汉以后再难有“衡决网罗、打破藩篱”思想家出世的平淡滞后状况进行比较,论证思想变迁与时代背景的密切关联。其次,在《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中,胡氏呼吁人们关注社会现实与社会实践,投身于社会洪流,批判时人研究学术不注重现实社会而仅限于空想的怪象。最后,胡氏在《阶级与道德学说》中,应用唯物史观说明道德的起源、实质,得出观点:“两千年的中国伦理思想史,只替我们说明一个唯物史观的法则。”^[8]这些研究成果,为唯物史观的中国传播作出了开拓性贡献。

(二)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阐明与运用

1919年的上海,处于国内各种社会矛盾的交汇点上,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的劳工阶级在五四热潮中不断接受洗礼并采取了最新的罢工方式,上海工人罢工运动成为世界劳工罢工热潮的一部分。此时,上海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深受触动,对中国社会经济问题更加关注。

这一时期《星期评论》《建设》皆已创刊,戴季陶、朱执信、胡汉民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理论家积极著书立说,将研究重点放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分析中国经济问题上,其对剩余价值理论表现出极高的认同。

其一,戴季陶等理论家通俗详尽地阐明了剩余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被认为是马克思划时代的两个发现之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石。戴氏等人最突出的成果就是翻译出版了考茨基的《马克思资本论解说》(简称《解说》)。其根据Karl Marx' Oeconomische Lehren(《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日译本(即高崑素之译《马克思资本论解说》)转译而来,详尽地解释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尽管这是一本通俗读物,但内容并不浅薄。《解说》参照原著,第一篇从商品分析入手,接着论述商品的资本化与劳动力成为商品的过程。通过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工银及资本三部分串联全书主线,对商品、劳动时间、剩余价值等基本经济现象进行细致分析。资产阶级革命派理论家出于共同的研究兴趣对其进行阐明解说,尝试以全面准确、深入浅出的方式阐明该理论,译者本人也快速吸收了其中的观点。此后,戴氏等人熟练运用该理论分析中国经济现状。由此可以看出,其已基本掌握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的精髓。

其二，戴季陶等理论家运用政治经济学理论剖析中国社会现状。“剩余价值”这一理论在戴季陶的文章中使用频率相当高，他也是中国最早一批应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分析实际问题的学人之一。戴氏深入剖析了中国工人阶级受到资本家残酷剥削与压迫的现状。他注意到《申报》刊登的一段不被时人重视的新闻——浦东陆家嘴英美香烟厂叶子间女工罢工。通过“最低限的工资”与“最高限的时间”对比，戴氏感慨在世界各国罢工风潮最激烈的时期，中国竟然出现“非文明”“不自觉”的罢工事件。他分析出三个原因：一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组织中，新机器的大规模使用对劳动力产生挤出效应，工人为了争取有限的劳动机会而展开激烈的竞争；二是因为中国本土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够发达，外国输入的工厂机器过多，代替了部分工人的劳动，而工人失业者为了生存而展开的竞争也自然更加剧烈；三是因为大多数劳工阶级没有受过太多训练，觉悟不够，以致很难形成有序一致展开斗争的新局面。他呼吁人们多关注这类重大而有意义的社会问题，多做实地调查与研究。不仅如此，戴氏还调查了上海棉纺织行业的基本情况。他以三新纱厂、恒丰纱厂、老公茂纺织公司等重要纱厂为样本，详细考察了工人数量、年龄、工资、工作时间、股份红利的数据，运用剩余价值原理计算得出资本家将获得无限膨胀的剩余价值的结论，即“纯益就可以蒸蒸日上”^[9]。戴氏在深入分析工人悲痛残酷的生存现状与资本家不断盈利的状况后，意识到“我们中国所缺乏的，却并不是资本家……”^[10]资本家希望用极少工资雇佣工人做长时间工作，而工人希望多得一些工资、少流一些血汗，二者的根本对立造成无法消除的阶级对立与阶级斗争。透视戴氏等人的文章，可以感知到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极高的认同感；同时也可看出，这些理论学说作为一种工具，也帮助戴氏等人从经济上更加透彻地研究中国社会动乱的根源。

（三）对阶级斗争学说的研究与宣扬

作为五四时期有着较高影响力的刊物，《星期评论》与《建设》可谓是舆论界闪耀的两颗明星，其共同见证了处在社会过渡期的国民党理论家们的思想活跃情形。当时，戴季陶、林云陔、朱执

信等人用相当可观的篇幅宣传阶级斗争、工人运动、苏俄革命及国际共运史等。他们顺应时代潮流，与共产党早期党员协同奋斗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战线上。

其一，林云陔等理论家对阶级斗争学说进行了热情解说。林云陔发表在《建设》杂志的论文《阶级斗争之研究》开篇明确了阶级斗争的原因。他认为，阶级斗争起源于普通劳动民众的权利与义务不对等。当权者无法协调阶级利益关系，上等阶级为谋私利不惜代价剥削下等阶级，下等阶级不甘长期压抑忍受，阶级斗争正是因为上述原因而爆发的。林云陔站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步的视角，得出了阶级斗争不可避免的结论，并给予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相当高的评价，称之为“近代社会主义之最要原理，亦最有研究之价值者也”^[11]。对于一些学者对阶级斗争的盲目批判，资产阶级理论家也纷纷作出回应和反驳。戴季陶对“互助调和论”进行了反驳，认为两个绝对不平等的阶级无法实现互助，批评了阶级对立这一历史事实因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而产生的谬论，认可马克思从以往历史中抽象出阶级斗争的伟大壮举。林云陔与朱执信作出的回应和反驳也相当精辟独到，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方法论，这里不一一赘述。

其二，戴季陶等理论家撰文积极鼓吹劳工运动。他们将中国的劳工运动视作世界的一部分，认为每个国家劳工群众的社会地位都是由自己所在的阶级奋斗而来的，鼓励中国劳动群众追随世界社会主义的进步热潮。他们提出，劳工群众除了依靠自身的奋斗以外，别无他路。通过对欧美各国工人运动以及罢工方式状况的调查和介绍，他们倡导中国工人在提高自身知识水平、组织能力的基础上，与资本家展开斗争，从而提高劳工阶级的地位。对于劳动者如何才能获得彻底的解放这一问题，资产阶级革命派理论家认为，唯有打倒资本主义私有制、重新建设无产阶级的新社会这一条路。

其三，戴季陶等理论家密切关注俄国革命及其对华政策。审阅这一时期《星期评论》《建设》刊登的文章目录可以发现，国民党理论家对十月革命基本持支持肯定的态度。早在1918年，孙中山就在给列宁和苏俄政府的电报中坦言：“愿中

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表现出对中俄携手并进的期待。戴季陶等人在论著中探讨了十月革命爆发的原因。戴氏认为，俄国的革命风暴是由社会上种种不公正的腐朽制度所激化的矛盾导致的结果。沈定一指出，因为旧俄国是一个极度专制的国家，所以成了这一场革命风暴的起点，而布尔什维克是在社会中的无数不平中涌现出来的时代洪流。针对社会上一些媒体接受西方媒体一面之词后制造一些不实舆论的情况，戴氏等人积极发文回应：“现在还有很多无识的蠢材并不去考察实际真相如何，盲目认为俄国革命是代表落后与残杀、掳掠的暴力行动。”^[12]戴氏进一步对“布尔色维克”一词的起源进行解读。他认为按照俄语翻译，该词是多数派的意思。他还进一步解释，该词起源于1930年俄国社会党所开的一场大会。在大会上，列宁一派与布列哈诺夫一派发生争论，前者占据多数，自此大家开始把列宁一派称之为“布尔色维克”。针对时人常常将“布尔色维克”与“过激派”联系在一起的做法，戴氏指出，其实这两个词并没有直接联系，这些中国人的看法，是因为受到了日本一些惧怕“布尔色维克”的人散布的不实谣言的影响。俄国政府对中国及工农群众的政策是促使进步人士把目光聚焦布尔什维克的关键。《星期评论》与《建设》不仅积极刊发苏俄对华宣言的内容，几位主编也纷纷撰文，真诚肯定俄国这一举动，称赞列宁所代表的俄国工农政府废除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对华政策；他们也密切关注着俄国革命的最新动向。

综上所述，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人物不同程度地向马克思主义“短暂趋近”。他们为此纷纷撰文立著，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尽可能地将其融入自身的指导思想中，对马克思主义表现出由衷的热情。出现这种现象，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条件，其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积极顺应时代潮流所作出的选择。从1902年马君武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研究》^[13]，资产阶级革命派就开始了向马克思主义“趋近”的短暂经历。回归到历史语境。自1925年孙中山逝世，资产阶级革命派党内诸多势力暗流涌动，出现严重分化。以戴季陶为代表的新右派崛起，其站在所谓纯正三民主义的立场，公然提出“反对新三民主义、恢复旧三

民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抛弃三大政策的宣告书”^[14]。他们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等内容的合理性，自此正式打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旗号，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由“短暂趋近”终至决裂。

三、资产阶级革命派向马克思主义“短暂趋近”的贡献与局限

五四时期，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传入中国的过程中，资产阶级革命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但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基本思想主线始终是三民主义，其对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也持以不纯粹的宣传动机，因此在面临“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转折关头时，他们最终选择了与马克思主义彻底分道扬镳。

（一）资产阶级革命派向马克思主义“短暂趋近”的贡献

第一，五四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早期共产党人协作奋斗在思想宣传阵线上。当时，国共两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几乎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全部核心内容，为当时的中国人了解、接受、传播、选择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大量的宝贵材料，共同掀起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在五四时期广泛传播的热潮。资产阶级革命派创办的《星期评论》《建设》与共产党人的《新青年》《共产党》等，都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瞿秋白曾评价，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一系列进步杂志纷纷介绍马克思的理论，而陈独秀、李汉俊、戴季陶、朱执信、胡汉民等人正是中国第一批宣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前辈。后来，共产国际派出代表来华寻找杂志主编们商讨筹建中国共产党事宜，其与当时两党协同热烈宣传马克思主义不无关系。

第二，资产阶级革命派在研究理论的同时，已经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去剖析中国社会问题，进而解决中国问题。在《孟子与社会主义》（1919）、《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1919）、《阶级与道德学说》（1920）等论著中，胡汉民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论，站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步的视角剖析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哲学史及伦理道德等问题。戴季陶、胡汉民、朱执信等人共同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解说》一书，充分运用剩余价值理论，剖析了上海劳工阶级受

到残酷压迫的社会状况。资产阶级革命家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积极阐释者和宣传者，更是国内使用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原理剖析中国社会的第一批探索者。

（二）资产阶级革命派向马克思主义“短暂趋近”的局限

首先，资产阶级革命派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吸收其思想用以改造、丰富三民主义。事实上，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理论家始终认为，“社会主义”与“民生主义”是一个名词，“社会主义”思想只是作为三民主义的补充受到他们的欢迎。孙中山等人出于“防止资本家垄断之流弊”“拥护国利民福者，实社会主义”^{[5]333}的动机宣扬社会主义，他们从唯物史观、剩余价值、阶级斗争等学说中寻找可与三民主义对应的内在统一性。三民主义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指导思想，是一个融合了中西近现代思想的复杂矛盾的兼容并包的思想体系，其总体上由两大类构成：一类是近代西方活跃的各种社会思潮，另一类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而马克思主义正是作为前一类的一部分被吸纳其中。由此观之，资产阶级革命派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是一种顺势而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选择性的引介，试图借助马克思主义理论找到一些解决社会贫富不均等现实问题的改造方法，等等，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实际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他们并非像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那样，通过唯物史观剖析社会，用社会存在来说明社会意识，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说明社会历史进程，最终谋求一条彻底变革的道路。二者的根本目标不同，也导致了二者最终的决裂。

其次，资产阶级革命派认同的始终是民生史观；民生史观是三民主义在历史哲学方面的精炼表达，其本质是一种唯心史观。孙中山等人在“突驾说”进化论的基础上，强调重视人民物质生活的民生史观，认为民生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人民的生存是社会进化的动力，决定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甚至决定政治与道德。孙中山曾在与美国《独立杂志》代表的一次谈话中表明，中国的政治革命已经完成，接下来将主要精力投入社会实业建设中。他提倡社会调和与互助，试图通过社会改良手段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15]。孙氏等人研

究马克思主义不是为了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恰恰相反，他们是为了防止革命的发生。他们认为，只有通过“民生主义”，才能使中国既可以效仿西方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又不至于造成贫富过于分化、无产阶级奋起反抗并最终导致社会主义革命的局面。

此外，民生史观作为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是一种英雄史观，不可避免具有空想性与主观性。马克思主义主张必须通过暴力革命，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并提出无产阶级革命不是从前封建王朝的盛衰循环，更不是资产阶级政党为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与自由的博弈，而是要彻底改变从古至今剥削阶级掌握政权的历史。在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看来，辛亥革命已完成政治革命的任务，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已然实现，当下最要紧的便是民生主义，他们希望通过改良手段实现社会进步。尽管他们也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等学说，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本质上认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孙中山等人所主张的民生史观，脱离人类历史演变的客观规律与物质基础，只谈抽象的“民生主义”，根本不可能对历史问题作出科学阐释，更无法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规律。

最后，资产阶级革命派虽承认阶级斗争的存在，但从根本上又惧怕阶级斗争的存在。这种内在的矛盾性决定了他们面对现实抉择时，萌生了事实与幻想糅合在一起的不切实际的想法；他们既强调阶级斗争的存在，又寄希望于通过温和的改良调和阶级矛盾。戴季陶观察上海、杭州、无锡等地工业发展与工人生活状况后，不禁感慨“究竟应该有甚么样的预备、甚么样的改革，方才可以免除将来社会大革命的危险？”^[16]其阶级属性决定了他注定只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他向中国民营资本家发出呼吁，希望他们赶快做好工人的教育、安慰、待遇、保险等工作，否则“前途的危险是不堪设想的”。戴氏将了解到的世界情况与中国现实联系起来，认为“非有大破坏，不能有大建设。但是一面破坏着，同时就要一面建设着”^[17]。他试图证明国家改造和社会改造已成为“全世界一致的声浪”，强调只有孙中山的建国方略是当下最切实的主张。资产阶级革命派认为，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的发展膨胀，导致社会贫富差

距悬殊,阶级冲突愈演愈烈,而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远不如西方发达,阶级斗争也并不严重。因此,中国的当务之急便是集中力量发展实业经济,同时也要防患于未然,防止阶级矛盾加剧。概言之,他们既要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又要防止阶级冲突,试图以和平方式缓和社会矛盾,这种方案注定是一种空想。

综上所述,在种种历史机缘助推下,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向马克思主义“短暂趋近”,但终未能突破三民主义的藩篱而永远止步于科学真理殿堂槛外。基于对其理论阵地刊物——《星期评论》《建设》杂志的文本考察,可以肯定,资产阶级革命派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引介,并尝试运用这一理论剖析中国现实,为当时的先进分子接受、选择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大量宝贵材料,客观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这一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思想战线上展开了合作,但是,他们与李达等人不同,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不能代表广大无产阶级的利益,更不可能将马克思主义付诸中国革命的实践。

质言之,资产阶级革命派对马克思主义的趋近,并非为了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武器指导实践,其最重要的目的是企图利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完善三民主义理论体系,抢夺革命话语权。他们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防备正在崛起的工人阶级的力量,将共产主义视为“国家民族很大的危险”,把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防止暴力革命的预防措施,这也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最终与马克思主义决裂埋下了伏笔。

参考文献:

- [1] 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等.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28.
- [2]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4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500.
- [3]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4] 陈邵桂,朱小舟.毛泽东论辛亥革命[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6(3):66-69.
- [5]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6] 李慧君.五四时期湖南进步报刊与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8(4):115-122.
- [7] 钟离蒙,杨凤麟.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M].沈阳:辽宁大学哲学系,1981.
- [8] 胡汉民.阶级与道德学说[N].建设,1920-01-01(1).
- [9] 季陶.中国劳动问题的现状:上海的劳动条件如何[N].星期评论,1920-02-01(1).
- [10] 季陶.劳动运动的发生及其归趣[N].星期评论,1920-03-14(1).
- [11] 云陔.阶级斗争之研究.建设[N].1920-08-01(6).
- [12] 季陶.对付“布尔色维克”的方法[N].星期评论,1919-06-22(3).
- [13] 马君武.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N].译书汇编,1903-02-15(11).
- [14] 王维扎.中国现代史大事纪事本末(1919—1949):上[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367.
- [15] 陈三井.中山先生与美国[M].台北:学生书店,2005:215.
- [16] 季陶.国际同盟和劳动问题[N].星期评论,1919-06-15(1).
- [17] 季陶.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原[N].建设,1919-09-01(2).

责任编辑:黄声波